中 国 文 化 概 论

（第 3 版）

教 育 部 高 教 司　组编
张岱年　方克立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 —3 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7(2023.11 重印)

ISBN 978-7-303-29293-6

Ⅰ. ①中… Ⅱ. ①张… ②方… Ⅲ. ①中华文化 Ⅳ.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19448 号

图书意见反馈：gaozhifk@bnupg.com 010-58805079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g.com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12-3 号
邮政编码：100088

印　　刷：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430 千字
版　　次：2023 年 7 月第 3 版
印　　次：2023 年 11 月第 59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策划编辑：周劲含 仉春兰 赵月华　　责任编辑：周劲含
美术编辑：陈 涛 李向昕　　装帧设计：陈 涛 李向昕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绪　论 …… **001**

上　编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 **013**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 013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 018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 **024**

第一节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 024

第二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 028

第三节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产生的原因 …… 032

第四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
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 035

第三章　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 **039**

第一节　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 039

第二节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 042

第三节　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 045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 **052**

第一节　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 052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 056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 059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 062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 065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 067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 070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会 …… 072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 074

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交融与中外文化交汇 …… **079**

第一节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 079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 …… 08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　编

第六章　中国语言文字 …… 097
第一节　汉语的历史与特点 …… 097
第二节　汉字的历史与特点 …… 101
第三节　汉语、汉字的文化功能 …… 105
第七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 113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学的伟大成就 …… 113
第二节　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技术的伟大成就 …… 119
第三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和近代落后的原因 …… 123
第八章　中国古代教育 …… 130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 …… 130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 …… 136
第九章　中国古代文学 …… 144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 144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 …… 146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 156
第十章　中国古代艺术 …… 160
第一节　辉煌的远古艺术 …… 160
第二节　中国古代艺术各个门类的风采与成就 …… 162
第三节　中国古代艺术的整体风貌 …… 171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 …… 175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 …… 175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巨大成就 …… 177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 184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 190
第一节　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 190
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191
第三节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发展 …… 199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哲学 …… 206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 …… 206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境界 …… 212
第三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 21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下 编

第十四章 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 **223**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 …… 223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特点 …… 226
第十五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 **241**
第一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意涵 …… 241
第二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 242
第三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 253
第十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 **258**
第一节 天人关系上的不同价值取向 …… 258
第二节 群己关系的定位 …… 264
第三节 义利与理欲：价值观的深层展开 …… 269
第四节 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 …… 274
第十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 **278**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 278
第二节 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 281
第三节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 285
第四节 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 289
第十八章 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 …… **296**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 296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反思 …… 298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 302
第四节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思考 …… 304
后 记 …… **313**
修订本后记 …… **315**
第 3 版编辑后记 …… **31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绪　论

本书概论中国文化，在编章展开之前，有必要就全书的核心概念、涉及范围、基本宗旨等问题预做说明，是为绪论。

一、“文化”界说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语。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周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层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周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并由此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而“人文”，则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束晳：《补亡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西方各民族语文系统中，亦多有与“文化”对应的词语，不过它们相互之间还有细微差别。拉丁文Culture，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语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法文，也用Culture来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从这层意义上分析，Culture的内蕴比“文化”更为宽广，而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语“文明”更加切近。文明，从词源学上追溯，正如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浚哲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共称四大“文明古国”而不称“文化古国”，原因正在这里。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近世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而带来的研究手段和条件的极大改善，尤其是社会进步大趋势对于精神养料的迫切需求，更直接促成专业化文化研究的长足进展。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已基本形成如下共识。

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的“植立之兽”（王夫之：《思问录·外篇》）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它同时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其中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人打磨石器的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以及最后完成的这件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的石器，都是文化现象，均属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上，也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①，这“共业”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面对如此庞杂的认识对象，人们自然要将文化的结构解剖当作文化研究的首要程序。

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我们在这里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一)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服务于他们自己，同时又约束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处理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相互关系的准则，并将它们规范化为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这一部分文化成果虽然不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但它们的特质、发育水平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一定方式所决定的。

(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

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学灯》，1922-12-0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域特色的行为模式。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汉书·王吉传》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是对人类行为文化的明确指认。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或发起的，但是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扩布的”①。

（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又可以再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社会心理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互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由文化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于后世。

依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疏密程度，我们又可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别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作为基层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和法权观念，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与社会存在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仍然要经过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起作用。作为高层意识形态的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其终极根源当然也要追溯到社会存在，但它们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社会存在通过一系列中介作用于这类高层意识形态，而社会心理和基层意识形态便是这样的中介。

广义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②，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界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文化。

狭义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

① 钟敬文：《民俗学》，见《钟敬文全集》2，4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② 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10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围。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这里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有别，文化概念广狭的确定，应由研究者的学科、课题、内容而定。本书肯定“大文化”概念，但基本上以“小文化”为论述范围，主要讨论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换言之，在本节前文剖析的文化结构四层次中，我们主要围绕第四层次即心态文化层而展开论析。

需要说明的是，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在研究人类的精神创造时，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在讨论关于心态文化诸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心态文化的影响、制约，总之，不能将“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与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了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文化正剧。本书所论的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自己生存发展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

中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一个渐次扩展的过程。

上古时华夏族[①]发源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而将周边地区称为四方。《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庄子·田子方》载“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均为此义。秦汉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中央政权建立，历朝版图时有损益，但基本趋势是不断拓展，清代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相继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签订边界条约，至此，酷似雄鸡的中国疆域最终定型。本书所论中国文化，在地域范围上，以此为界。

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

中华民族是现今中国境内由华夏族演衍而来的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的总称。“中

① 华夏族，汉族古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之得名，由来已久。“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唐律释文》中说：

>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中国境内各族间的联系纽带愈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渐趋完备。进入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国境内各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遂成为包括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共同称谓。在全世界范围内，“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本书所论，重点在中国文化的“昨天”，具体而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全书的上编、中编以及下编的前三章，均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讨论，仅在全书结尾部分论及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传统文化在影响现实的同时，也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所以本书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之后，也以一定篇幅讨论它的转型与新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本书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教材，意在给大学生们提供一个了解祖国悠久、丰厚文化遗产的简明文本，使之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我们不企求读者同意本书的全部观点，但望能启发朝气蓬勃的探索。

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

开放世界的八面来风驱散了曾经笼罩我们民族心头的封闭阴云。人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地球村”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地球村”的合作与竞争，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真切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诸如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之类体质特征要困难得多。然而，任何民族，其文化形态尽管纷繁多彩，但都可以寻觅到该民族文化的主色调、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自由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芸芸众生中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一个民族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但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民族精神。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可靠途径。

(二)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

跨世纪一代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这一千秋伟业的认识前提是切实认清中国的国情。国情不是空洞物，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数千年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因袭的重负。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吸取得还不充分，但其负面影响已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忧虑。深入剖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今日中国的影响，总结 70 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认清国情的必要工作。

(三)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文化，就是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保存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每个有志于为民族的未来贡献心智和汗水的中国人，都应当努力熟悉传统，分析传统，变革传统，而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正是培育这种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的最好课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这样的学习、研究对象，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重要。我们要注意掌握以下几种方法。

（一）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演化，内容异常丰富。我们既要对它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又要避免被无法穷尽的枝节材料所淹没，唯有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惟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二）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

中国文化的要义，多被记录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之中。研读这些古籍，尤其是其中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如《诗经》《周易》《论语》《史记》等，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众多要素，是以非文本的形式，存留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例如起居习俗、宗教礼仪、道德规范等。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宽阔领域，将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结合起来，相互比照，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对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动态的、全面的了解。

（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

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对于养育自己的中国文化，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苛求前人，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非历史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被前辈的认识成就所束缚。一味沿袭前说，只会窒息科学的生命。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唯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前贤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2.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 冯天瑜等编著：《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庄锡昌等：《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2. 怎样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3. 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包括哪些内容？
4. 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文化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单就作为世界文化主体的东西方文化而言，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所以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由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当然，这两方面也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关于这一点，在第二节中还要专门讨论。但无论如何，地理环境是在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地理环境不同于现在的地理环境，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必须将它们放在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注意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本节所要讲的是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所以许多与今天基本相同的地理要素一般从略。

疆域　政区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历史尽管还没有完全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但可以肯定它已经统治了范围不小的地区。经过商、周两代约13个世纪的发展，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10年，秦的疆域北起河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此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疆域虽然时有盈缩，但基本的趋势是逐渐扩大，逐渐巩固，不少王朝都拥有过今天中国领土以外的疆域。如，从西汉中期至西晋末年的400多年间，朝鲜半岛的东北部曾经是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自西汉中期至明末年的千余年间，今越南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唐朝和元朝的北界都远达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唐朝的西界一度直抵中亚的咸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千米地域的统一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连条约都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侵占的既成事实。但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国土免遭更大的损失。

今天，中国陆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千米，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千米，国土面积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

政区(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地方，它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建立为前提的。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建立以后就必定要划分行政区域，如商和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从上到下“分土而治”，天子和各级诸侯的直接统治区都很有限，自然不需要什么分级管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经过一系列兼并，剩下的诸侯国范围越来越大。同时，各诸侯国一般都将被灭国置于国君的直接统治之下，不再分封新国，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也迅速扩大。因此，直接向国君负责的行政单位——县、郡应运而生。一开始，县与郡并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主从关系。但发展到战国后期，随着县的普遍设置，郡成了县的上一级政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郡县制基本上推行到了全国。

秦、汉都实行郡县制，即由数十个至百余个郡管辖数百个到一千多个县或县级单位。到了2世纪末的东汉末期，原来只起监察作用的州才成为最高一级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开始全国只设十几个州，但汉以后，州的数量不断增加，到南北朝后期已达到数百个，一个州所管的郡县越来越少，三级制已变得毫无意义。

隋大业三年(607年)合并、撤销了一些州县，又将州改为郡，重新实行郡、县二级制。尽管唐朝将郡改称州，并有16年时间又改州为郡，但基本上都是二级制。由于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众多的州(郡)级单位总有点鞭长莫及，为了对地方实施监察，开元年间(713—741年)在全国设置了十五个道。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为了加强地方的抵抗实力，不得不普遍设置方镇，以节度使掌握方镇的军政大权。方镇(又称道)成了州以上的一级政区，形成方镇(道)—州—县三级制。

977年，宋太宗废止了方镇辖州的制度。但全国有三百多个州(府、州、军、监)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单位，朝廷难以直接管辖，因而不久就由原来专管督征运送财赋的各路转运使兼管军民事务，形成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全国先后设过十五路至二十四路。但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割据，一个路的不同事务往往由不同的监司所管辖，不同监司的辖区又不尽相同，州一级还有不少事务直辖于朝廷，所以是一种不完整的三级制。金灭北宋后，实行的政区制度基本与北宋相同。宋朝还将一些比较重要的州改称为府，以后府越来越普遍。

元朝的中央政府称为中书省，在进入中原的初期让它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进驻各地，统管军民事务，此后成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元朝中期，除了行中书省的直辖区(又称腹里)外，全国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省以下一般有路(或府)、州(或县)二级，少数也有路、府、州、县四级。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行省制，原来的省改称布政使司，分别任命三位官员负责民政、司法监察和军务。1427年后，全国划分为两京(南、北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两京十三省或十五省。省以下废除了路，但设有若干分守道、分巡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此后，朝廷为了地方治安或边防，陆续向各地派驻总督或巡抚，成为最高的地方行政官。到明朝后期，全国有总督、巡抚辖区约三十个。清初设十八省，以总督或巡抚为长官，以下只有府(或直隶州、直隶所)、县(散州、散所)二级。每省还分为若干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中华民国废除了府一级政区，州、所都改为县，又重划了道区，所以成了省—道—县三级制。国民党政府废除了道，企图实行省、县二级制，但到20世纪30年代又在江西首先分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不久推行到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了这一制度，称为专区，以后改称地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基本的政区依然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二级制。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地区陆续改设为市，成为介于省与县之间的行政区划，出现了省—市—县三级制与省—县二级制并存的局面。

在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历代还设置过各种特殊的政区或机构，如汉、唐的都护府，元朝的宣政院辖地，清朝的将军、大臣辖区等。少数民族政权或边疆政权有的模仿中原王朝的政区制度，有的建立自己的行政区划，但游牧民族的政权一般仅以部族、军事编制或游牧区作为划分的单位。

民族　人口

历史上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居住和活动的民族很多，除月氏(zhī，一作支)族的主体在公元前2世纪迁到中亚以外，其他各民族几乎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在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中，除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几个民族是在以往一两个世纪中从境外迁入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形成的，或者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除汉族以外，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突厥的一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中国历来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领土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的。早在春秋时代，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就已经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此后随着自身的扩大、迁移和其他民族的迁入，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交融。在开发和巩固边疆方面，少数民族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如藏族及其前身吐蕃在青藏高原，古代的西域诸族和维吾尔族在新疆，蒙古族在内蒙古，契丹、女真和满族在东北，高山族在台湾。如今，各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和信念。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在汉朝设置政区的范围内有近6000万人口，未列入统计的少数民族和此范围之外的中国人，估计还有数百万，合计超过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的1/3。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其境内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加上辽、西夏境内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就更多了，当时世界人口约有3.2亿，中国人口也占了约1/3。1850年，世界人口达到约12亿，而中国人口已突破4.3亿，所占比例并没有减少。

当然，在以往两三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经历过无数次起落。在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持续发生时，人口损失的幅度在20%以上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甚至超过50%。但即使在低谷期，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一般也在1/5以上。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力。

这样庞大的人口分布很不均衡。公元初，60%的人口分布在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淮河以北，燕山山脉以南的地域内，这一范围内的人口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77人。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人口稀少，尤其是今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地，还有大片无人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是首都长安及其近郊，每平方千米超过1000人；二是今山东菏泽、定陶、东明一带，每平方千米263人。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人口的迁移和自然条件的变迁，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以淮河、秦岭、白龙江作为划分南北方的界线，北方和南方所占人口的比例从公元初的7∶3演变为10世纪末的4∶6，14世纪前期竟达到2∶8。明清以来，人口的北南差有所缩小，大致稳定在4∶6。10世纪以后，主要的人口稠密区已经转到南方，其中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福建等地区人口尤其稠密。19世纪前期，苏州府(大致相当于今苏州市)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千米1000人，为全国之冠。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发地区的扩大，地区间人口密度的差距有所缩小。到20世纪初，以云南腾冲—黑龙江瑷珲(今黑河)一线为界，中国形成了东南人口稠密区和西北人口稀疏区，这一格局至今仍无明显改变。

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相当频繁，规模也很大。14世纪中叶以前，移民的主流是由北向南，即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及更南地区，其中以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影响最大、移民人数最多。在明朝初年，数百万人口从长江以南迁至江淮之间、淮河流域，从长江中游迁至四川盆地，从山西迁至华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平原。此后直到20世纪前期，移民的主流都是从平原进入山区，从内地迁往边疆。随着沿海城市和工矿城市的兴起，又有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迁入这些城市。此外，历代统治者以行政或军事手段将人口集中在首都附近，边疆或其他地区的强制性移民，敌对政权间的掠夺性移民，北方游牧民族、边疆少数民族的内迁，也曾多次发生，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来自中亚、阿拉伯甚至欧洲的移民在中国定居，也交融于中华民族。如今天的回族就是以13世纪自中亚、阿拉伯和波斯迁入的移民为主，吸收其他民族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人也不断移居海外，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从15世纪以来就以东南亚为主要迁移区。19世纪中叶以后，向海外移民的规模日益扩大，移民及其后裔的数量已达数千万。中国移民对所在国和中国本身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诸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地形　地貌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海拔500米以下的土地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2%，而3000米以上的却占25.9%。全球超过8000米的12座山峰，中国即有7座。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部，宽阔缓斜的大陆架则在我国大陆东南侧延伸于海下。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的三级台阶，被称为“三大阶梯”。青藏高原是最高的第三级地形阶梯，被称为“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5000米，许多山峰超过7000米。在高原的东侧是举世闻名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高原内部的巨大山脉间地势宽缓，湖盆星布，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青藏高原以东、以北，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为第二阶梯，其内部地形相当复杂。由此往东是最低的第一阶梯。

与漫长的地质年代相比，数千年的历史只是极短的瞬间。但在局部地区，由于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地形、地貌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第二阶梯内，比较明显的有：1. 湖泊的发育和消亡。一些著名的湖泊改变了形状和面积，或者完全消失了；一些新的湖泊产生并继续演变。2. 水道和水系的变迁，流经东部平原地区的江河下游一般都发生过变化，其中黄河和海河水系的变迁尤其剧烈，决溢改道极其频繁。3. 海陆变迁。从辽东湾到杭州湾之间不少沿岸地区都是最近两三千年间陆续成陆的，但也有一些陆地重新沦入大海。4. 黄土高原的变迁。水土流失造成沟壑发育，使原来的“原”(或作塬)日益分割缩小，地形破碎，生态条件越来越差。5. 沙漠的变迁。沙漠面积扩大，吞没了一些绿洲和城市；也有一些沙漠后退了，重新得到开发。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气候

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真正舞台”①。中国的气候有三个特点：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主要表现为冬夏盛行风向有显著的变化，随季风的进退，降水量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二是大陆性气候强，表现为冬、夏两季平均温度与同纬度其他地区或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冬季低于同纬度地区，夏季高于同纬度地区，年温差较大。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这些特点，有史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受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气候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和差异。这里以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温度和湿润度两方面为例。

温度的变化。五六千年来，中国气候的总趋势是由温暖转向凉爽，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幅度不同，而且有过多次反复。在新石器时代，正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年平均温度大概要高2℃。公元前10世纪时气温变得寒冷，但只持续了一两个世纪，到春秋时期又趋于暖和。公元前1世纪气候已经转冷，到公元4世纪前半叶达到顶点，渤海湾的年平均温度估计比现在低2℃。6世纪时黄河流域的物候普遍比现代迟10天到2周。8、9世纪时气候稍趋温和，但10世纪下半叶气候又转寒。13世纪初开始回暖，从南到北的气候与今天大致相同。但14世纪又转为严寒，17世纪的气温达到最低点，以后逐渐转暖。

湿润状况的变迁。中国处于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于极端，非涝即旱，而且在相邻地区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总的说来湿润状况还是有变化的。五六千年前的温暖期也是一个气候湿润期，随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这一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到2500年以前气候稍稍湿润，然后就再次变干。近500年来旱灾多于水灾，其中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17世纪、18世纪前半叶至19世纪前半叶是三个旱灾持续出现的时期。

这两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复杂后果，对经济的开发、民族的迁移、人口的增长、文化的传播，以至社会的治乱和王朝的兴衰都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决定或不决定，而应该做全面的认识。

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7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上述 3 种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状态所构成。这 3 种地理环境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①。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理环境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只有自然环境。在人类产生之后，完全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但在人类漫长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的影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地理环境主要当作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起作用。到了近代，就更难以将这三者严格区分开来了。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千差万别的原因，也是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人类的活动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结果的缘由所在。

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所以在人类早期，即人类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成的环境时，地理环境对人类各方面的活动几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弱。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能力和程度就越大。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是以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为限度的。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不但疆域辽阔，而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中纬度，气候温和，又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全球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季风气候发达。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

① “地理环境”(陈传康撰)，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64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活。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天然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比水土流失严重时的含量要高得多。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不在少数，基本为草原等植被所覆盖，水土流失相对并不严重。而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常常泛滥改道。当时华北平原北部还有众多单独入海的河流，所以有不少地方会受到泛滥改道的影响。近海地带由于地下水位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因此，黄河中下游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的地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结果，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这正是当时自然环境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但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原因，黄河中下游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春秋战国时当地还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之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毫无地位。从秦朝开始直到清朝初年，历代最稳定的、设置行政区域的疆域范围，基本都是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地区。这一范围四周并不都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尽管王朝的军队一次次外出远征并获得胜利，但却很少将自己的正式政区扩展出去，根本的原因就是要考虑这些地区是否适宜农业生产，能不能养活当地的居民。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大量汉族人口不断从黄河流域迁往南方、西北、东北各地，文化上的优势和数量上的多数使这些移民最终成为迁入地区的主体人口，他们所传带的文化自然也成为迁入地的主体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传统文化也吸收了牧业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基础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吸收便都以能否适应农业文明的需要为前提。前面已经提到，尽管中国的自然条件在以往数千年间有一定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幅度有限。由于中国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气候的波动一般只影响农业区的南北界，而不会减少它的面积，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看，有利于中国文化延续的地理因素就更明显了。

中国的这片农业区的面积和产量在东亚大陆一直遥遥领先，供养着数量众多的人口，因而很自然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所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方文明传入之前，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当然不可能对它形成冲击和挑战。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适应于农业地区。

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中心不仅距离遥远，而且隔着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一系列地理障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要越过这些地理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因此除了负有政治、军事使命或有高额利润的吸引，一般性的人员来往和交流很难进行。至迟从西汉开始，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欧洲的使臣、商人、僧人、教士、学者、军人、避难者、降人、俘虏等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原地区，有时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还具有统治民族的地位(如元朝的色目人即是这类外来移民，享有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南人的地位)。但他们毕竟既无人数上的优势，在地理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也无质量上的优势可言。所以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在一些局部地区还形成过与中国文化有本质区别的亚文化，但在总体上却无法动摇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亚洲以前，西方没有一次军事行动能够到达中国。751 年的怛罗斯之战是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唯一直接冲突，但不久崛起的吐蕃王朝隔绝了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实际上起了抵挡阿拉伯帝国兵锋的作用。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有时往往起了完全隔绝的作用，例如海洋、大江、高山、沙漠、沼泽、丛林等都曾是先民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

中国领土辽阔，从最东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到最西的帕米尔高原约有 5200 千米，从最北的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到南海诸岛南端约有 5500 千米。所以，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蕴藏的自然资源也丰富多彩，各不相同。国境内的一些主要山脉，如东西向的天山、阴山、燕山、昆仑山、秦岭、大别山、南岭，南北向的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北东向的太行山、大兴安岭，北西向的阿尔泰山、祁连山以及弧形的喜马拉雅山等，主要的河流如长江、黄河、淮河、汉江、辽河等，往往成为地理区域的分界线。各区域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农业区与周围地区之间，也出现在主要农业区内部。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①]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非常有限，一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所以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狩猎、养殖、捕捞、采集等谋生活动，此后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又产生了农业、手工业、冶矿、林业、牧业等多种行业，才形成各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8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同的物质基础。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各地的社会、政治、行政制度也不相同。中原地区较早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权，实行统一的行政区划；而在游牧民族地区则长期盛行军事奴隶制或部落联盟，人民随季节迁移。山区人民居住极其分散，长期游离于王朝的统治之外，有些地方很晚才脱离原始社会。西北沙漠中的绿洲范围有限，相互间以及与外界的联系困难，所以形成数十个“国”林立的局面。边远地区环境闭塞，不仅生产技术落后，社会进步也相当缓慢，有些地方直到20世纪前半期还保留着奴隶社会的残余。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衣食住行方面，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土地的依赖，发展成重农和安土重迁的观念。但生活在海滨的人民却把海洋视为生活的必需和财富的来源，不但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还致力于海上交通和与海外的联系。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绿洲小国本身土地有限，又没有开发的余地，但却位于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更为严酷，只能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总之，强烈的地域特点使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如在穿越秦岭的道路没有开辟之前，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非常困难，却很早开通了与西南境外的联系。近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精美文物，就具有与中原同时期的器物不同的特点，很可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与中原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早期或者根本没有陆路联系，或者交通极其艰险，所以海上交通发达，很早就开辟了通向沿海其他地区、近海岛屿及东南亚的航线。直到东汉初，岭南与中原的交通主要还是依靠绕道福建、浙江的海路，所以中原文化的传播相当困难，越族文化依然占主要地位。

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

中国的地理环境究竟是有利于开放，还是有利于封闭？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首先，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中国的西北、西南固然是高原、高山、戈壁、荒漠，但东南却有10000多千米的海岸线，可以通向世界各地，就是在西北和西南，也存在着多处通道，在公元前就已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有力的证明。

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地理障碍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人类早期所无法逾越的障碍，以后大多成了坦途。但即使生产力提高了，地理障碍的影响依然存在，就是在今天，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通毕竟要比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困难得多。

最后，自然地理环境并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也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滨海或环海的地理环境不一定等于优越的条件，更不会自然地产生先进的文明，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航行只是一种交通联系和传播文明的手段。如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内，世界其他文明中心大多在西方，而在唐朝以前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主要依靠陆路，所以地处内陆的长安和洛阳反而比大多数沿海地区更加开放。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障碍，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为什么中亚、阿拉伯的商人可以不畏艰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来往于丝绸之路的中原人却少得可怜呢？为什么当西方人千方百计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时，中国的统治者却要禁止海上交通，连早已开辟的航路也不加利用呢？这些固然有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所处的地位优越。因为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中国的确是东亚乃至当时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无求于人。尽管当时中国人的优越感和自我陶醉也是一种保守的表现，但与近代中国已经处于落后地位时一些人的夜郎自大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我们应当看到，与地中海文明相比，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给文化交流带来的障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2. 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思考题□

1. 历史上哪些地理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请举例说明。
2. 为什么同样的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中华农耕文明在这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流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及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显示了祖先们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追述先古“有道帝君”的作风，便是孜孜以农业为怀的君子，《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史记·周本纪》称赞周人的先祖公刘“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农耕与部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人民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古代诗歌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所谓“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诗经·豳风·七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即是其生动写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列国竞雄，政治家们为了在激烈的对抗中求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魏国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史记·荀卿列传》)，竞为列国所仿效；著名的商鞅改革，其“耕战”政策使秦国的大军在关东所向披靡。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作为治国的不易之道。

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中国农耕区域的向南扩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汉晋以降的数百年间，北方战乱频仍，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向南迁徙，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而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城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苏杭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即反映了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东南财税”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交融

当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依靠畜牧、狩猎为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匈奴列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游牧人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征战，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历代王朝无不竭尽全力加以抵御。然而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终究无法与“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汉书·晁错传》)的游牧人在军事上做长期的追逐争锋，虽然在历史上也曾出现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远征漠北的行动，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

处于守势的中原农耕人世代相沿用以抵御游牧人的最基本策略，是“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桓宽：《盐铁论·本议》)。历尽艰辛前赴后继而修筑起来的万里长城，正体现了中原民族试图把农耕区围护起来的防御心态。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只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这两者以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为中介，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交融。北方的游牧民族勇猛善战、粗犷强悍，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中原农耕文明博取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中原农耕区，固然带来了战争，但因而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汉族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家姓”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游牧民族姓氏直接转化而来的，中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融是整体趋势。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游牧人，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特别是当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先进优裕的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恩格斯：《反杜林论》），而出现农耕化的趋向。这一趋向的结果，不但进一步充实了农耕文明的内在涵量，同时也促进了中原农耕经济的周边扩展和多元交汇。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他们历经数千年的相互交融、互为补充，汇成了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化经济成分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延续性，这与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古代欧洲文明史截然不同。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一方面造成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藕断丝连、含混不清。因此，从纵的方面讲，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远古时代的村社经济残余，到宋元明清时期演变为乡族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乡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三代以来的奴隶制经济残余，亦长期并存于农耕经济之中，直至明代，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贵族分封制度，虽然从秦汉以后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历代不绝，如明代的藩王勋戚经济就成为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横的方面来考察，“昏（早）出莫（暮）入，耕稼树艺”（《墨子·尚贤》）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农耕经济是自然经济体系，这是借用了西欧中世纪庄园制自然经济体系的用语，实际上，中国的农耕经济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自然经济差异甚多，二者不可画等号。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依附农奴等，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并不很突出。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由来已久，并且不时相互变换。中国的个体家庭经济，很早就与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早在战国时，孟子就指出农家“以粟易械器……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是“天下之通义”（《孟子·滕文公上》）。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下述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

>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源)也。

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明清之际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棉花、桑蚕的生产，是农家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地产木棉……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并济”(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四》)。以食租为特征的中国地主，在广置田产的同时，也对工商业生产有浓厚的兴趣，“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嘉靖江阴县志·市镇》)。中国农耕经济就是这样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扩充了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简单再生能力，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维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流不息。

内敛型的海洋贸易

在中国内地广阔农耕区的东南面，有浩瀚的大海。海洋事业的开拓，是促进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然而，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而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它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的。

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的理念之中，他们把“皇天眷命，奄有四海”“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大禹谟》)作为治道的高妙境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往，应当建立在“宾服贡献”的基础上。唐宋时期，中国与海外的经济联系渐次加强，东南沿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昌黎先生全集·送郑尚书序》)。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成了闻名世界的贸易港口，出现了“市井十洲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的繁荣景象。但这时的海外贸易，一方面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夸示海外，“远抚蕃夷”，而且在不少场合是“赐品”多于“贡品”，不计经济得失；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于海外奇珍异宝的需求，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较少发生联系。这种朝贡式的贸易直至明代前期犹然。明成祖以“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费信：《星槎胜览·序》)为己任，当有人主张对入贡互市的外商征税时，明成祖的答复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明史·食货志》)。互市在政治上的意义仍然超过其经济的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私人对外贸易有长足的进步，海洋商业收入已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白银货币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末福建郑成功家族的海上势力，执中国、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中国的海洋事业一度出现勃勃生机。但是，政府对于私人海商集团的扼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清代海洋商业的顺利发展，而明清以来移居海外的商民，也被政府视为“自弃王化”的刁民，备受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当西方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梯航东来之际，内敛型的中国海洋事业，不能不大大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

第二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殷商西周：土地国有的自然经济阶段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农耕经济体制的不断自我调节，中国数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呈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显著标志。远古时代，土地属氏族村社共有，劳动者在家长的率领下，在共有土地上共同耕耘收获。夏、商、西周时期，这种原始的土地共有意识演变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广大庶众“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商君书·徕民》），耕种国家的土地。国家为实施对土地的分配管理和贡赋的收取，在地官司徒之下设有载师、闾师、县师、遗人、均人等职官，形成国家干预农耕生产的政治雏形。

这种国有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相授受，即所谓“田里不粥（鬻）”（《礼记·王制》）。西周时期，土地经常由天子分封给各级诸侯、贵族，但从原则上讲，诸侯贵族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可随时把土地收回，或转赐别人，拥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三代以上，虽至贵巨富，求数百亩之田贻子及孙，不可得也。”（张英：《恒产琐言》）

在土地国有制下，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为主，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甲骨文合集》00001）的卜辞，“协”字在甲骨文中像三耒共耕，“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集体耕作制的反映。《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有西周前期集体劳动场面的生动描写，所谓“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诗经·周颂·载芟》），“率时农夫，播厥百谷……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周颂·噫嘻》）。到西周后期，集体耕作的土地有了公田、私田之分，《诗经·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劳动者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作私田。孟子曾把这种集体耕作的田制称为“井田制”，并加以理想化的追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农夫们终年忙碌，结果还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诗经·豳风·七月》），处境十分悲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殷周时期土地国有和集体耕作制，是与那一时代生产工具铜石并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相适应的，也是在氏族公社解体，进入初期阶级社会，血缘贵族保留土地公有制外壳，并继续实行集体生产的一种经济制度。到了西周后期，土地国有制出现某些瓦解的迹象，诸侯贵族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他们也逐渐和周天子一样，可以随意处理自己的封地，或用战争的手段，掠夺别人的封地。公田和私田分野之后，不可否认那些耕作私田的劳动者，也逐渐拥有对私田的部分所有权。奴隶制度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征兆。

东周以降土地私有化和个体生产形态的演进

东周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土地国有形态走向瓦解，井田制破坏，变公田为私田的现象普遍出现。诸侯贵族争夺土地农人的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善战的士人、农夫可以依靠军功而取得土地。春秋末年，晋国赵简子伐邯，在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左传·哀公二年》)战国时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记·商君列传》)

尤其是土地买卖的出现，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时期“田里不鬻(鬻)”的老例。春秋时晋国已有“爰田”即易田换田的现象，是土地买卖的先声。商鞅在秦国推行“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的土地政策，土地自由买卖日益合法化、普遍化。

东周以后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也打破了以往那种集体生产的农耕传统，而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形态过渡。一个家庭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男耕女织、以织助耕，或以工助耕、以商助耕的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小农业，逐渐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国家直接向个体生产者征收赋税徭役。春秋战国时出现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和“初税亩”(《春秋·宣公十五年》)，就是政府对个体土地所有者建立统制经济关系的开始。而这千千万万个对国家政府承担赋役义务的个体生产家庭，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国家政体的坚实基础。

随着土地的日益私有化和个体家庭经济的成长，土地成了社会各阶层争相获取的目标，而拥有政治地位、金钱财富的人，在猎取土地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于是自秦汉以来，“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的现象屡屡出现，个体家庭经济分化为地主和农民两个不同的形态，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的互为盈缩，构成农耕私有经济运作的基本特色。

当然，东周以降土地私有化经历着一个循次演进的过程。春秋战国之后，旧的贵族分封制破坏，私人地主增长。但至唐代，国有土地仍占有相当比重，专制国家对土地私有权仍保留种种干预。唐代中叶均田制破坏之后，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专制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契约制的租佃关系在唐宋以后普遍出现，农民对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土地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社会生产日益多样化，个体生产者亦从封建社会前期以粮食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渐向多种经营的方向艰难迈进。这种渐次加强的多元经济结构，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延续注入了活力，从而呈现出唐、宋、明、清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繁荣盛世。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自给性农业和商品性手工业的结合尤为普遍，个体生产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多种经营的加强，使农家取得较大收益，增强了对封建剥削的负荷力和对人口增长的适应力，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并在原有的生产结构里，有所更新。

商品经济的波浪式前进

东周以后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家庭个体生产经营，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农耕经济进入了纯粹的自给自足状态，恰恰相反，当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交换也悄然出现。虽然这种商品交换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的，但是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具有发展较早的特点。

西方封建社会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经济单位是领主庄园，领主庄园内不仅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而且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农奴手工业者，因此“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在中国则不同，地主占有的剩余价值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品极其有限，这样就使地主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以解决消费品的不足。广大的个体农民局限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手段更为有限，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剩余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孟子所谓的“农有余粟，女有余布”，需要进行“通功易事”（《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再者，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统治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先秦的典籍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商品交换与市场流通的记载。《尚书·酒诰》鼓励民众“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经》中也屡有关于商品交换的记载，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卫风·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诗经·大雅·瞻卬》）等。秦汉时期，史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衝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盐铁论·力耕》）。这种商业交换活动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商品生产、商人资本、城市货币经济等，伴随着中国的农耕经济而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不渝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当农耕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明之时，商品经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也随之繁荣；而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商品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附性格，又促使工商业者的普遍归宿，是最终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去，促使地主、商人和官僚的结合。这种特点，大大削弱了商品经济对农耕自然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但就总的趋势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化的深入，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向。而这种不断进步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多元化封建经济的繁荣和更新，对旧的生产体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量。正因为如此，到了明清两代，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进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变动时期。

中国传统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中华大地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祖先们世代不息的顽强拼搏，辛苦耕耘，推动着中国的农耕经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断进步。至16世纪前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育，繁荣富庶；中国的农耕文化，仍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值得自豪。

中国的农业，经历了5000多年的风风雨雨，聪明务实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农业科学，其中尤以农具精巧、良种培育、多种经营、集约耕作和充分利用自然力而著称于世。铁犁的使用，轮作复种技术的推广，中国远远早于欧洲各国。蚕桑和茶叶的发展，曾令世界倾羡不已。中国人民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也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灵巧的工艺品，精美的纺织品，长期风靡于世界市场。造船业的发达，使中国人最早开辟了亚非两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冶炼业的久盛不衰，为中国农具的改进与货币的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炼丹术等化学知识的积累和不断丰富，使古代中国在瓷器、漆器、酿酒、染色、兵刃、食品等方面的制造技术也相应取得了突出成就。而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被称为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明的伟大科技成果。

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也是西欧中世纪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战国时的城市，就已有“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的盛况；唐宋时期的长安、开封、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是闻名世界的大城市；而明清两代的城乡工商业集镇，更是遍布全国，“百货俱集”(《吴江县志·市镇》)。长距离的商品贩运，很早就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各地商品货物，可谓无远弗届，形成了全国性的商业联系。货币的大量使用，与西欧中世纪货币“几乎没有地位”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纸钞的使用，更是中国对世界货币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节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产生的原因

社会经济既早熟而又不成熟

十六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以突飞猛进之势，跨入了近代社会，而中国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却备受挫折，步履蹒跚，出现了迟滞状态。

从根本上讲，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产生。与西欧社会相比，许多到西欧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却早就出现了。且不说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于各个封建王朝时期，其他如土地买卖出现在战国秦汉之际，促使中国的土地财产权很不稳定，有所谓的“千年田，八百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之说。迄于宋元明清，土地买卖更加频繁，出现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现象，有的连佃农也分享有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并在法律条文上有所规定。再如中国的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流民之波，从北到南的大迁徙，促进了南方和周边地区的迅速开发。即使是缺乏生产资料的佃农阶层，也并非完全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有退佃、迁移的自由。作为经济剥削方式的地租形态，也是劳役、实物与货币地租长期并存。凡此种种现象，在西欧国家都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时，但在中国却“古已有之”。

但是，中国经济的早熟却未能促成它的成熟发展，相反却加重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性。从西欧历史的发展来看，商品生产、城市经济、土地买卖、农民的离土自由、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及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不仅要等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本身就是与封建庄园制度格格不入的，它们的出现，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迅速地瓦解着西欧中世纪封闭式的庄园封建社会。反观中国的情况，这些早熟的因素，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它的补充形态而出现的，这就使中国的农耕经济大大扩展了它的内涵结构，可以比较灵活从容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当然，在中国农耕经济内部滋长的商品经济，同样具有较活跃的“革命”性质，对自然经济有着潜在的腐蚀瓦解作用，但是这种腐蚀瓦解作用成长到一定程度，往往因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而被化解或吸收，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地主与富商大贾的相互转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使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现象，始终未能走上成熟的阶段。再加上中国早熟的经济因素往往与社会、政治诸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早熟的发展又使人们迷恋于现有的成就，拒绝新的思想和社会变革。这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带来了落后的停滞因素。在这种内部机制的自我制约下，中国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不能不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

建立在个体家庭经济上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而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政体。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其继任者的整体趋向是一代不如一代，行政效率衰退和政治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严重。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游牧民族的入侵或民众的大暴动，于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交替、稳定与战乱互易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

这种王朝更替的变化周期又是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兴衰周期大体同步的。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政治大都比较清明，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农耕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增长。但是这种美景缺乏后劲，升平社会逐渐走向政治腐败；随着政治腐败的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又爆发了新的动乱，社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耕经济经过5000多年的磨炼，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农业生产技术足以夸示世界。但是从生产力纵向的发展来考察，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是战国至汉唐之间，铁器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奠定了中国农耕技术的基本格局。唐末宋代以后，中国的农耕技术并无明显的突破，明清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之宋代，大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农业生产总产量的增长，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提高，而是主要依靠扩大山区及周边地区的耕地面积和粗粮品种如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以及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维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增殖显得至关重要。而新王朝前期清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每当承平数十年、百余年之时，人口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速度增长，人口增长率逐渐高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率，就会造成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生产日益受到破坏。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土地、赋役、流民、边防等方面的问题更加尖锐，终于使社会再次进入长达十余年、数十年的战乱时期，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从而自发地调节了人口与物质生产的比例。然而这种以战乱、灾荒等方式进行的自发调节的社会循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周期性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双重失调，对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尤为明显，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社会相比，尚无太明显的差距，但是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明代后期繁荣的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遇到了严重的挫折。而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小农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经济渐次繁荣，但人口的增长却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至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人口已逾四亿。当时人已称土地的增长“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这种恶性的周期性破坏，不能不严重地遏制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难产的状态中。

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箝制和束缚

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国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既是中央集权政体的运转工具，同时由于官僚体系是由千千万万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个体私有者(官或吏)组成的，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又具有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格。这种自我矛盾的政治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日益进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了。

经济剥削是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集权政体需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军队，政治特权阶层需要奢华的消费，这就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的负担，而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成千上万个官吏，利用权力以谋私，法外苛征，更使下层民众不堪负担。在重农抑商观念的指导下，工商业经济所受到的剥削尤为严重。明代时，“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张萱：《西园闻见录·关税》)；清代更有“处处皆关，则处处有税”(《皇清奏议》卷二十一)的剥削。经济上的沉重剥削，使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经济的进步十分艰难。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围绕着农耕经济这一核心的，它带有明显的保守、怀古特征，言必三代周孔，成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当社会进步、经济变迁加剧之时，守旧派人士总是怀念三代的井田制度和力耕自足的生活境界，所谓“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盐铁论·园池》)。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民众普遍安于现状，缺乏开拓精神。因此，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但科技的运用却不受重视，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却未能在中国本土得以发扬光大，就与这种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密切相关。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布局也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成长。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是摧毁庄园封建制的有力武器，而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又往往是军事中心和消费中心。政府出于财政的需求，对盐、铁、军需等商品，采取专卖的政策，致使许多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例如明清两代最负盛名的徽州商人，是以经营官盐著称的，而山陕商人则以九边军需为主要经营项目。商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了商人阶层的封建依附性。

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区广大的封建大帝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城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系很不协调。但作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其治理天下的原则是一视同仁，“恩泽咸被”，因此在政策的实施上带有明显的“裒富益贫”(包世臣：《上百节相书》)的性质。明清两代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成了政府经济剥削的重心，赋役负担十分沉重。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家政策上的平均主义，使落后地区拖住了先进地区的后腿，箝制了先进地区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发展。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原有的格局内打圈子，不可能出现飞跃式的前进。于是，自17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拉开了差距，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困难境地。

第四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自三代以来，中国的农耕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未曾走入难以克服的困境，而循环式的复苏和进步则周而复始，使农业自然经济得以长期延续。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三代以来，中国历史经历了战乱与稳定的周期性运动，王朝的兴衰更替不可避免，短期的国家分裂时有发生，特别是游牧民族的南下与入主中原，都曾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出现。然而，中国的农耕经济依然向前发展，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华文明亦未曾中断。相反，短期的战乱与分裂，更增进了中国文化的坚韧性和向心力。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代，恰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扩展传播的重要时期。鲜卑族在中原建立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所谓“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魏书·乐志》)，体现了中华民族无法抗拒的认同感和文化的向心化合力。辽夏金元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但文化的传承一如既往，雄才大略的忽必烈曾深切地意识到“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鲁斋遗书》卷七)，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交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清朝也是如此，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不久，便已“习汉书入汉俗”(《清世祖实录》卷八四)。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并且历经动乱与分裂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洗礼而不断得到充实升华，这种文化传统是任何外来势力所无法割断的。然而，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也往往使人们产生一种“瞻后”式的思维方式，所谓“圣人设教，为万世不易之法”，尽善尽美的制度和礼教存在于远古的三皇五帝之中，后世的治平之道便是“克绳其法”，偶有一些枝节的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更化”。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和增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着文化的守旧性格。这样，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文化便显得暮气沉沉，缺乏积极进取的冲动了。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较，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结构，这一特点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

春秋战国是中国农耕经济的重要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诸子竞秀、百家争鸣的兴盛时期，儒家的仁义淳厚，道家的清静超逸，墨家的谨严兼爱，法家的因势严峻，各家尽管主张不一，相互辩难，但是思想文化通过社会变革的洗礼，诸子百家在争鸣中取长补短，锻炼了自己的学说。到了秦汉时期，儒道融合，综汇百家，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新的高潮。“天下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正反映了先秦百家学说精华相互包容荟萃的历史事实。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多有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又形成了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格局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然而随着中国农耕经济的扩展，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又促使这些区域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

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日臻博大，而且还长期吸取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增添异彩。汉代北方民族的器用杂物、乐器歌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华各民族大交融的时期，充满生机的北方民族精神，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空气，“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魏书·崔浩传》）。盛唐是古代中国最为开放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格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京城长安更是“胡化极盛一时”，胡汉文化相互交融，促进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即使是对外域的文化，中华民族最终亦能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佛教自汉代传进中国以来，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一个高潮，中国固有的儒、道、玄等文化，通过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会通交融，获得新的营养而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明末清初，西方的耶稣会士东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虽然这时的中国已渐趋保守，文化的包容性格有所减弱，但许多有识之士，仍提出了“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李之藻：《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同文算指序》)的主张。尤其是耶稣会士们传进的科学技术，曾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忘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文化开放心态，正是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格的体现。

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结构，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造就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是，中国农耕经济的既早熟而又不成熟，又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性格。

早在先秦，我国已有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人与人在道德上的平等，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这种民本意识，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而派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固然成为农民反抗压迫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中国历史稳定与动乱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秦汉以后，知识分子大多陷入经解的泥潭和科举的旋涡，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尽管中国有四大发明以及一系列的科技贡献，但这些创造贡献始终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许多科技发明无法得到社会的推广应用，往往出现中断、失传的现象。祖冲之的数学著作，在唐宋时就已失传。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清康熙以后已无人过问，直到近代才从日本翻印回来。

中国农耕经济和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相互配合，加强了传统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格，较之汉唐已有明显的衰退。明清之际，固然有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关注西方耶稣会士带来的科技文化，但同时亦不乏严拒者。拒绝者的理由，就是认为儒家文化已尽善尽美，“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圣朝破邪集》卷一)。清代乾隆皇帝面对着西方的通商使者，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这些言论，是何等自负与盲目。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前赴后继，卧薪尝胆，焕发自强自新之道，才使中国文化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林甘泉、宁可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思考题□

1. 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经济有哪些特点？
2. 宋明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为何长期迟滞不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章　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除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外来因素的制约外，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就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古国发展史比较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至少有以下特点。第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包括嫡子之制、庙数之制、分封制度等，从理论到实践，其完善程度都是世界各国所无法比拟的。第二，专制主义严密。中国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尽管先后出现过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等不同的统治，但其专制却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地主阶级的专制，不但延续时间长，而且存在着日益强化的趋势。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甚至科学技术等。因此，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就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节　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宗法制度的产生

阶级产生以前，人类走着大体相同的道路，先是原始群居，此后形成氏族，继而发展为部落。这些组织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但在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出现重大差异。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古希腊，人们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中，很早就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强有力地冲破了蒙昧时代的血缘纽带，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不同，中华民族是在一块广袤的大陆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其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有别于古希腊。中华民族栖息的这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亚大陆，有无数河流、湖泊，有高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平原，面积巨大，在先民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却相当狭小，很早就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定居农业生活。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当然，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与文明时代的血缘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原始民主制的基础，而后者则是阶级专制的基础。从现存文献和地下发掘材料看，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产生于商代后期。根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周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这里所说的氏、族、宗就是宗族存在的证明。西周建立以后，统治者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的确立

周人最早生活在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有着悠久的农业生活传统，宗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突出地位，这一点恰恰成为周代确立宗法制度的基础。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制礼作乐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宗法制度，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度等。

一、嫡长子继承制

夏朝的王位继承方式，由于文献的缺乏，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商朝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影响的存在。到商代康丁以后的五个王，才稳定下来父子相继的传递方式。周王室从成王之后推行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较之兄弟残杀争位，其优点在于定分，即权力早已有所归属。古代统治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多妻中有一个正妻，即“嫡”，其子为嫡子；其他妻子为“庶”，其子为庶子。按照周制，最高统治者称天子，统治天下的土地和臣民，继承王位的，必须是嫡妻长子。至于这位嫡长子贤与不肖，不在考虑之内。如果嫡妻无子，就只能立庶妻中级别最高的贵妾之子，至于被立者是否为庶子最年长者，也不在考虑之内。此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说：“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古人把商代的兄终弟及和周代的父子相继称作“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亲亲即立弟，尊尊即立嫡。显而易见，嫡长子只有一个，只有他能占据最高王位，这就杜绝了兄弟之间为争王位而造成的祸乱，使西周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过一段政治上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种制度是从父权制社会演化而来的，是用父子血缘亲情来维系王权的威严和稳定。周天子及其继承者，从君统看，是天下的共主，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从宗统看，他又是天下的大宗。西周统治者划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分封为诸侯，为小宗；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封为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之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成为士，为小宗。由此可见，嫡长子继承制与宗法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封邦建国制

封邦建国制简称封建，即今人所说的分封制。分封制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发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由周人创立。因为分封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就是说，周王室分封的主要旨意是给同姓子弟亲属封以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

分封制度的具体内容，古代文献称之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左传·桓公二年》)。《礼记·礼运》把这种逐级层层分封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诸侯受封要举行一定的仪式，由司空授土，司徒授民，即《大盂鼎》所说“受(授)民受(授)疆(疆)土”。诸侯受封后就成一个地方邦国，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周天子与他有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等；诸侯对周天子则有必尽的义务，如朝聘、进贡、出兵役劳役等。诸侯依照天子的办法分封卿大夫，卿大夫的领地称为“采”或“邑”，史家一般称为采邑制。不过采邑与封国的性质有诸多不同，其主要差异是采邑没有封国所有的许多独立自主的权力。卿大夫也依此例分封士。士是西周统治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阶层，一般要靠自己的技艺和本领为卿大夫服务。

三、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制度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所以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就是为达到维护宗族团结的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手段。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塑造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而且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代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对于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巩固政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这一传统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有发展之势。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今北京故宫前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便是明清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是明清的社稷坛，也就是“左宗右社”的格局。“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它们共同表示着这个王朝的天下和对全部土地臣民的占有。

第二节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春秋以后，随着姬姓血缘关系的松弛，具有完整意义的西周宗法制度开始瓦解，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式微，以下凌上、僭越礼制的现象普遍发生，天子不复巡狩，诸侯不朝觐纳贡。礼崩乐坏，说明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到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但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均以新的姿态出现于历史舞台上。选拔官吏的办法亦与前不同，当官要靠举荐、军功、直接上书游说等手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废分封，行郡县，实行编户齐民，“车同轨，书同文”(《礼记·中庸》)，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吏为师，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对血缘宗法制度和观念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冲击。但秦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多年时间，秦始皇的一些反对血缘关系的做法被汉初的统治者所否定，其影响力就大大被限制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虽有所变异，但其模式基本上循而未改。

家天下的延续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西周时期统治天下的主角是姬姓家族。周之后，姬姓家族的统治灭亡，但其他家族的统治相继而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公卿之制，但权力的核心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自称始皇帝，以后二世、三世、四世……要千万世地传下去。这远比“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宗旨要贪婪得多。刘邦本为编户齐民，但当了皇帝后，权力就成了刘氏的权力。他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是想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刘氏家族的手中。这种家天下思想不只统治者有，还深深地影响到广大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众。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时为反对王莽的新朝，大家都去找西汉皇室的后裔作为自己的旗帜：绿林找来刘玄，赤眉找来刘盆子。此后有司马氏的晋朝，杨氏的隋朝，李氏的唐朝，赵氏的宋朝，朱氏的明朝，爱新觉罗氏的清朝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家天下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族就一直统治下去，这之间，糊涂甚至白痴皇帝也大有人在。嫡长子继承制这一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历代皆沿袭下来。但是，除了皇位继承仍采取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外，民间家庭财产的继承关系，一般已改为诸子均分，而对家族的重视则是一贯的。

封国制度不断

分封制曾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秦汉以后，尽管郡县制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行政区划制度，但封国制度一直不同程度地或以不同方式被历朝历代所保留。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废分封，立郡县，子弟为匹夫。但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的政治家在总结秦朝速亡的经验教训时，其中重要一条就归咎于秦始皇废分封。所以西汉初年刘邦就大封同姓王，就连在封侄子刘濞时看出他面带反相，也只说了一句“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史记·吴王濞传》)，而依然封其为吴王。汉景帝时刘濞果然联合其他诸侯王发动旨在夺取中央权力的七国之乱，使西汉朝野大为震惊。平定叛乱后，朝廷生出了一系列对付封国的办法，如削藩、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但谁也没有把封国干脆去掉，包括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其原因就在于封国之王与皇帝为同姓，是一个血缘家族。刘秀建立东汉后，鉴于西汉封国反叛的教训，封皇子的事尽管大臣多次提议，他始终犹豫未决，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宗法关系的束缚，于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分封诸子。此后历朝历代，一般都没有跳出分封皇子的窠臼，只是在管理方式和封王所得利益多寡上有所不同罢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少皇帝为封国问题大伤脑筋，也还发生过比七国之乱更为严重的封王反叛，如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等，但历代皇帝照封不误，究其原因，仍然是宗法关系严重存在造成的。

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动荡不安常常困扰着中国历史，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如果说有变化，也仅仅是一个旧家族的灭亡和随之而来的一个新家族的诞生，就像万物有生有死一样。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家族的动荡变化是比较大的，但超姓氏的家族本身却依然在发展。到汉代，由于较长时间的安定环境，一些强宗豪右迅速发展起来。刘秀登基后，察觉到自汉武帝以来逐渐形成的官僚地主、商人地主、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劳动人民纷纷沦为奴婢，出现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他七次下令释放奴婢，多次下诏检核土地，甚至处死一些不负责的地方长官，但最终都因为这些豪强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势力太大而宣告失败。这更助长了这些大家族的发展，使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拥有巨大权力，而且广占良田，形成一个个宗族色彩十分浓烈、封建自然经济经营方式的地方庄园。汉末政论家仲长统曾描述过这些大家族的气派：富豪人家，房子数百栋连在一起，肥沃的土地布满四方，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奇物珍宝，巨室容不下；马牛羊猪，山谷放不开。豪华的居室，有妖艳美丽的童妾；广深的厅堂，有能歌善舞的歌伎舞女。肉多得臭而不能食，酒多得腐而不能饮。庄园中等级森严，最高的是庄园主，其次是宗族成员，往下依次有宾客、徒附、部曲、奴婢，各有各的义务，各尽各的职责，如同西周时的一个个宗法关系联结的封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家族制度却有进一步的发展，江北有大姓，江南也有大姓，而且也出现了豪门与寒门的区分。豪门大族为了防止寒门的混入，十分重视家谱和族谱的编写，以至编写家谱成了一门学问。东晋的贾弼之撰写十八州族谱，南朝的刘湛、王俭、王僧孺都编撰了百家谱，为家族的发展尽了心力。家族制度延续到清代，甚至民国时期，也没有衰亡的迹象。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族权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它既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作用，所以族权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为理学家所垂青。宋朝的张载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张子全书》卷四《宗法》)。程颐进一步指出：“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程氏遗书》卷十八)大理学家朱熹还设计了更为具体的宗子法方案。显而易见，宋代以后族权的膨胀，与宋明理学家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在中国，尽管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是按地缘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于原始的氏族部落，但却始终未能摆脱氏族血亲宗法关系的纠缠。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是家族的政治化。这是中国与古印度、欧洲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大大影响了文化形态。

古印度虽然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但由于有比较成熟的宗教和发达的商业贸易，形成了独特的种姓制度。四个种姓有严格的区别，之间不得通婚。每个种姓内部有长老会议，负责裁断本种姓成员。血亲关系存在于家庭甚至种姓内部，但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却基本上不起作用，因而也就不存在家国同构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代欧洲贵族、贫民、奴隶之间，等级差异十分鲜明，中世纪的僧侣、贵族、平民的层次更为分明，血缘政治基本上被等级政治、地缘政治冲垮了，所以更谈不上家国同构。

宗教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家国同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故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新大陆游记》)这一论说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节　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中国与欧洲政体的差异

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其具体演化过程是：产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明和产生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及古巴比伦王国的文明，汇集到古希腊，由古希腊传至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再由日耳曼人传播到整个欧洲。

古代埃及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太阳神。有趣的是，法老和祭司奉祀不同的太阳神，两种势力斗争非常激烈。第二十五王朝时，祭司的权力曾一度超过法老的权力。所以，一开始埃及国王的权力就存在一种强大的抗衡力量，即宗教势力。另外，早在新王国时期(约与中国的商朝同时)的埃及，工商业就比较发达，与地中海沿岸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这无疑对王权专制又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就是说，古代埃及的法老在集中自己的权力时，受到了外界势力的严重挑战。在两河流域和古印度，情况也大体如此。

中国则不然，统治者凭借武力，比较顺利地夺取并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神职人员成了他们顺从的奴仆。文明到来之前，中国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一样的，但迈向文明的第一步，中国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政治权力很快被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很早就形成一个权力核心；宗教曾经也是很发达的，但被武力所吓倒，神职人员拜倒在世俗统治者的足下。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力一开始就不存在一种与之抗衡的势力，所以以后的专制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完备。

马克思曾把君主专制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以英、法、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型和以中国、土耳其为代表的东方或亚洲型。由于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所以其社会政治结构也就迥然有异。例如英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在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时封建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族势力已经由强变弱，新兴资产阶级势力勃然兴起，斗争的任何一方均尚未压倒另一方，“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掺合在一起，受到开导，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英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有僧侣、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所以专制君主在维护旧的封建贵族利益的同时，也拉拢资产阶级，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活动。这在客观上保护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君主专制应当说从中国历史踏入文明门槛的那一刻起就已形成，所以专制的传统十分悠久。这种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即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

一、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

司马迁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从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这说明，我们的祖先之一黄帝的权力，是用武力取得并用武力加以扩大的。“未尝宁居”是说黄帝为权力而整日操劳，但就从对权力占有的方式来看，他要比古埃及的法老幸运得多，因为没有其他外来势力与黄帝分享这个权力。所以中华民族刚刚进步到文明的边沿，就形成了一个祖先，一个权力，一个核心，这无论较之古代埃及，抑或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都是不同的。

从黄帝传至禹，禹巩固自己的政权多用武力，对此史书多有记载。禹死后传至启，启同样用武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先是“益干启位，启杀之”（《竹书纪年》），继而“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

商朝的建立同样处处以武力为先。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商朝建立后，商王率兵四处征伐的记载非常多。殷墟出土的成千上万的甲骨文片清楚地说明，商时的统治者崇尚祭祀，凡事要通过贞人来请示“上帝”。尽管这些贞人也像古代埃及的祭司一样，担负着传达“上帝”意志的神圣职责，但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对卜兆的解释往往要服从统治者的意志。贞人这种仆从式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处境，自然难以成为商王的抗衡势力，当然也就更不必说由他们去直接参与权力之争了。

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后，虽然分封了许多姬姓诸侯国，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既是宗法血缘关系，又是君臣关系，这种体制也是一种专制。例如，西周时规定诸侯要定期朝聘周天子，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诸侯就要受到严厉惩罚。“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

周天子的这种专制，持续到公元前8世纪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式微，诸侯坐大，卿大夫崛起，家臣活跃，社会开始发生激烈动荡。这种社会动荡的本质，是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这种新制度就是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就其本质特征说，这种君主官僚政治体制从春秋时代产生起，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止，基本上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形成区域性的君主专制体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由三公九卿组成统治集团，皇帝通过公卿统治全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所发展，三公九卿制度转变为三省六部制。宋辽金元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有进一步发展，严厉限制和防范地方割据，军权、政权、财权、司法权都归朝廷。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其主要标志是皇帝个人专权，相权被废止。明代成立内阁，清朝设军机处，都是皇帝自己的办事机构。

二、经济基础稳固

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周时期，君主把全国看成是他的私有财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就证明了这一点。春秋以后，出现了土地多级所有的局面，即土地所有权分属于各个等级，并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土地占有，此后土地私有逐渐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国家对土地的占有量是很大的，而且官僚、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非常严重。人们不难发现，历代农民起义多起因于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残酷压迫剥削。所以即便土地私有，广大的自耕农和佃农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都是极为有限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封建统治者和广大农民处在对立统一之中，没有广大农民的存在也就没有封建地主的统治，所以当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之时，政治家就会发出警告，朝廷也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对矛盾的平衡。如历史上出现过的释放奴婢为庶民，限制对土地的占有，抑制兼并，进行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改革，如占田制、均田制、两税法、一条鞭法，甚至严厉打击不法豪强等，都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与专制统治者为维护地主和小农经济所构成的经济基础相一致，历代统治者无不采取打击工商业的政策。工商业的出现不但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而且它的发展又能冲破小农经济单一的简单再生产模式。毫无疑问，它是历史前进的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打击工商业就是打击这股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由于封建小农的自然经济被人为地保护起来，把能够瓦解自然经济基础的工商业视如洪水猛兽，因而这个基础就变得异常稳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一股强大势力。

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从总的趋势来看是日益强化。秦始皇当皇帝后，“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大权独揽的传统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也未断绝。康熙皇帝就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东华录·康熙一百三》)康熙的表白和秦始皇如出一辙。

皇帝实行专制统治，需要百官来辅佐。秦始皇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九卿，丞相为百官之首，辅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负责全国的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九卿分掌各方面的事务。汉承秦制，丞相的职权范围仍然比较广泛，但皇帝和丞相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秦始皇时的丞相李斯，汉高祖时的丞相萧何，都受到过无端的猜忌。汉武帝游宴后庭，设内朝，与宫内官吏决策国家大事，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受到真正的挑战。西汉末年，本为少府属吏的尚书，因贴近皇帝，地位日隆，开始分曹办事，外朝的权力进一步下降。刘秀建立东汉之后，鉴于王莽的教训，把大权完全集中到宫廷，“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后汉书·陈忠传》)。尚书台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魏晋时期，尚书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并总揽了秦汉九卿的几乎全部职权。三国曹魏有八座尚书，其首领为尚书令，是中央最高政务官。下为左右仆射，又置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等五曹尚书。八座尚书之外还有尚书郎。尚书、尚书郎分曹的情况多有变化，比较繁杂。到唐代定型为六部二十四司，这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皆由尚书统领。至此，原本地位低下的尚书终于因巩固皇权的需要而逐渐上升为掌握全国政务的最高官职，实际上从东汉中期以后尚书已取代丞相执掌朝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在大体相似的情况下发展着，中书省的出现就颇耐人寻味。中书官名，起于西汉，曹丕称帝时置中书府，魏晋之际改为中书省。中书本是宦者为之，汉成帝时改为士人担任。魏晋时期，中书省的权力急剧膨胀，其首领中书监、令，“掌机衡之任”(《通典》卷二二《职官典·尚书省》)，取代尚书令和尚书仆射而成为真宰相。这就是说，当尚书省成为像三公九卿那样的外朝官僚机构时，皇帝又从身边提拔亲信，并委以重任，把原来由皇帝亲手制造的那部分官吏顶替下去。

门下省的出现也是皇权强化的例证。东汉时，少府下属有侍中寺，至晋，置门下省，首领仍为侍中。侍中秩比两千石，为三品，四员，入侍帷幄，出拥华盖，与皇帝非常亲近。给事黄门侍郎亦四员，与侍中同掌奏文案，赞相威仪。俗称侍中为“门下”，给事黄门为“小门下”。南北朝时期都置门下省。东晋以后，皇帝以侍中常侍左右，经常与他们“切问近对，拾遗补阙”(《晋书·职官志》)，他们也成了真正的宰相。到南朝的梁、陈时期，“举国机要”(《通典》卷二二《职官典·尚书省》)都在中书；而“献纳之任”(《通典》卷二二《职官典·尚书省》)又归门下，这样，尚书省就成了单纯的行政执行机构。

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出现的历史，我们可看出，原来由皇帝和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决策的格局，由于皇帝专制的本性决定，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轨迹是：皇帝总是把大权交给身边的亲信侍从，以取代皇室以外庞大的官僚机构。当这些亲信侍从又发展成像丞相那样的官僚后，皇帝又从身边找另外一些亲信侍从，委以重任，来取代原来的那些不再是亲信的官僚。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正常的决策行政系统。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的出现，其意义也在于此。正因为如此，秦汉盛行的宰相制度，此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到明清终于消亡。

当然，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存在着若干制约的因素，如朝议制度、谏议制度等，但这些制度没有对皇帝的否决权，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也做出过世界性的贡献，其严密性曾令世人赞叹、模仿，回避制度也曾为外人所学习，特别是隋唐时期开始确立的科举制度，后来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先导，这些都是应该加以总结和充分认识的。

四、对人身控制严密

对中国政治史陌生的人，特别是与中国传统迥异的西方人，往往对中国皇帝在皇宫里就能有效地控制每个平民家庭，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控制平民的严密网络。中国是最早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的国家。《周礼·地官司徒》有属吏曰大司徒，其任务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中有“傅律”，即男子成年后必须登记的法律，以便官府安排徭役。如果隐匿不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或申报废疾不确实，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于弄虚作假的，不但里典、伍老要被处罚，而且同伍的人也都要受处罚，统统予以流放。中国很早就有一种什伍组织，把老百姓编入什伍之中。《管子·立政》说，管仲在齐国组织民众，以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要修筑围墙，堵塞缺口，只定一条进出的道路，只设一个进出的门户。要细心看管门户，注意关锁，钥匙由里尉掌管。任命闾有司，按时开闭里门。闾有司要负责观察出入的人，向里尉报告情况。凡是进出不遵守时间，穿戴不合时宜，家眷及其他人中有行迹异常者，闾有司发现，要随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

商鞅变法与此一脉相承，他制定连坐法，把百姓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的户籍办法编制起来，要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可以得到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不告发的则要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敌者受同样处罚，其余九家若不检举告发，要一起办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旅舍的主人如果收留了无证之人，与"奸人"同罪。

这些制度和法令，使居民失去了流动的可能，国家便可轻易地按郡县、乡里、什伍系统征收赋税、徭役和兵役，帝王的诏令也就很容易达到每个家庭了。

中国专制统治者还十分重视用控制生计的办法，把农民牢牢固着在土地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对土地的管理，管好了土地，也就管住了人民，因为民以食为天。"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汉书·食货志》)从商周的井田制到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还有以后的占田制度、均田制度、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无不包含着固着农民在土地上的目的。如此时间既久，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风俗也就形成了。

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这种范式所带来的正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劲，注重道德修养，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它的负价值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性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这种范式带来的正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造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文人学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等；它的负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一定的服从心态，个人自信心的缺乏，文人的影射传统等。这种负面影响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抑制方面。例如，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就讲过强调民权的观点，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在尔后的社会生活中这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自然也就得不到贯彻实施。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宗法与专制的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的反映则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用政治伦理秩序代替了法律秩序，政治大于法律，伦理也大于法律，因而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在中国古代很难找到立足之地。这种价值取向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一特点，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以后经过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形式上虽多有变化，但这一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到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逐渐瓦解，新时代的新文化才有可能形成。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等编著：《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3.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思考题□

1. 在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是什么？
2.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有些什么特点？
3.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有何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卡西尔：《人论》)，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第一节　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中国人起源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因此，中国文化的起源与中国人的起源实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1965年5月，考古学者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前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直立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直系远祖腊玛古猿的许多材料，以及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到晚期智人(新人)各个发展阶段的丰富材料相继被发现，世界上迄今只有中华大地在人类起源的各个环节中没有缺环。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大荔人，再到山顶洞人，颧骨高突、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

从古猿转变到人类，这是生命物质所实现的质的飞跃，而文化就产生于从猿到人的转变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始物质文化

在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 7000 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

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取火技术的发明有时记在燧人氏名下，有时记在伏羲名下，有时又归功于黄帝。这种歧说并陈的现象，正反映了原始初民经过了广泛的、多渠道的实践才发明取火技术的文化史的本来面目。揆诸考古学实证，元谋人是否已学会用火，学术界尚有争议，而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证明，距今约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存从自然界取来的火。关于火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恩格斯有精辟论述。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反杜林论》)他又肯定地指出："甚至可以把这看做人类历史的发端。"[①]如果说制造石器使人与动物开始分手，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最后诀别。

火尽管不同于一般的工具，如石器、木器、骨器等，是一种化学反应现象，但是，作为猿人进行物质生活的重要手段，火的使用从本质上讲也属于工具的范畴。就性质而言，工具无疑是一种物质产品，然而，制造工具的活动中已包含有意识性内容，因此，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而且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从距今 7000 年前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迄今为止，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七八千处。其中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1921 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45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1959 年发现于山东)、红山文化(大致与仰韶文化同期，1935 年发现于辽宁)、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 年至公元前 2250 年，1936 年发现于浙江)、马家窑文化(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600 年，1923 年发现于甘肃)、龙山文化(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2300 年，1928 年发现于山东)、屈家岭文化(公元前 2750 年至公元前 2650 年，20 世纪 50 年代发现于湖北)。

原始观念文化

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1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大自然(太阳、大地)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会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四川珙县、云南沧源、广西宁明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上，也清晰无误地出现了太阳神的形象。民间长久流传的“地母”之说以及古文献中“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汉书·郊祀志》)的记载，则透露了先民土地崇拜的踪迹。此外，太阳、土地以外的自然物，也为中华先民所崇信：“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

中华先民对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了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人们的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原始人一方面重视子孙的繁衍，另一方面也崇敬创造生命的祖先。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男性祖先日渐成为供奉对象。祖先崇拜往往有严格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中华先民虔诚地寄托对祖先创造生命的崇拜。

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原始宗教形式。“图腾”是美洲印第安人奥基华斯部落的语言。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在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对于后世文明意识来说，原始宗教无疑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然而，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处于低下水平的原始时代，它具有在人与自然之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之间起制约作用、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起补充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等文化功能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原始宗教才能成为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在原始观念文化中，原始艺术亦有生动发展。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猪头，这是最早的陶塑艺术品。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像，隆鼻、凹眼、大耳，耳垂部位有穿孔，可见当时人们已有在耳朵上悬垂饰物的习俗。陶绘是原始艺术的又一样式，考古发掘表明，那一时期的陶绘图样千姿百态，几何纹样、动植物图形都是先民创制陶绘艺术的基本素材。原始雕刻艺术亦有众多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筒花瓣交错，结构别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疆呼图壁县的生殖崇拜岩画皆气魄宏大，画面生动，展现了先民粗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泼天真、生机盎然的人类童年气息。

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了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大致说来，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会则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生。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推举方式即著名的禅让。传说，尧在位 70 余载，衰老之际，知其子丹朱不肖，看中了贤孝而有才的舜，经过多方考验，“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到暮年，亦仿当年故事，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上古社会关于权力嬗递的传说，并非虚幻的美妙编造，而确实是当时制度文化的折光。

禹的时代开始了今天已初显轮廓的夏文化的进程。依据考古发掘和零碎的文献资料，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建立起来。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华大地上初现熹微。

上古文化分布

中华文化的发生，一开始即呈多元状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东北等地区，都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基于考古实迹，学者们提出了中国文化多元发生的新解释。1977 年，夏鼐发表《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划分中国古代文明为七大区域。① 苏秉琦则划分起源期的中国文化为六大区系（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省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中华文化的多元发生，不只有考古学方面的充足证据。神话传说及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②

① 参见《考古》，1977(4)。

②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先民的一部分，很早就自称“诸夏”或“华夏”，或单称“华”“夏”。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神话传说中那位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都属于这个集团。

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继之而来，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黄帝由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

经过对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人猿叩别、文化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史记·夏本纪》)，中国文化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然而，其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婚姻演进方式、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包括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在内的精神生活，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殷商神本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徙，史称“不常厥邑”(《尚书·盘庚》)。

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尚书·多士》)。这些由掌理卜筮和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虽然诘屈聱牙，散漫无序，但其间已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我其祀宾，作帝降若。我勿祀宾，作帝降不若。”(《甲骨文合集》6498)故殷商甲骨文中，“占曰”之上大都冠以“王”字。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以表示对“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祭祀使用牲畜有四五百头者。殷人也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们生前担任最高祭司的职务，死后“宾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交通桥梁。

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智力、体力水平不断增进，对神的力量的崇拜渐次淡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周人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 11 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大雅·文王》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上。有关内容第三章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了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的“制礼作乐”。

周代的礼制是周代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周人之“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侧面。其形式为“仪”，即各种礼节和仪式。周制规定，各级贵族祭祀、用兵、朝聘、婚丧，都要遵循严格的合乎其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以体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上下尊卑之别。战国时编纂的《仪礼》（又称《礼经》）一书，便是对西周仪礼的追记和理想化描述。“礼”的内容，一是“亲亲”，贯彻血缘宗族原则；二是“尊尊”，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周代礼制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在其主旨上，就是“别贵贱，序尊卑”，以保证“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礼记·丧服四制》）。范文澜曾指出，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①。王国维也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②。这些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其要旨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③。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475、4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同上书，454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 722 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的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 300 年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时期的 250 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 220 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在这充满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史记·太史公自序》)，予以评论。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从学术源流、基本思想等方面详为论述。由于诸子百家多肇衍于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之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在谈到《淮南子》“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时说：“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同异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淮南子要略书后》)胡适在分析战国诸子成因时，也发表意见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①]这些说法都甚有见地。

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同时又对神灵崇拜做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儒家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儒家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儒家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但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汉书·艺文志》)。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则有所不同，它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

①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见《胡适文存》卷二，3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然”，绝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了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的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嗣后，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起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法，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反映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墨家在战国时亦属显学之一，“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但在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只有在历代农民暴动时有关公平、互爱及至鬼神、符命的宣传中，或可听到它的嗣音，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以邹衍为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了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朝统治未久，便因统治政策的失误而被农民起义推翻，起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古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唯有古罗马。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杜牧：《阿房宫赋》)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苞(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相如答作赋》)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的。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打开丝绸之路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叙》)。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厉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李斯以周朝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是为“书同文”。

第二，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一车可通行全国，是为“车同轨”。与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同时，秦始皇调派民夫，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今包头西北)的“直道”，劈山填谷，长达1800余里。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第三，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结束了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是为“度同制”。

第四，“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是为“行同伦”。

第五，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是为“地同域”。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但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都是这类尝试性的作品。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更系统地展示了这种努力。《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秦统一天下后，更执着于“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李斯上奏，建议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隋书·牛弘传》)，从而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思想的专制必然引起思想的反抗，就连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都不满其为人刚戾自用，逃亡而去。秦始皇闻讯大怒，严令追缉，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坑儒，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其酷烈性而激起后世儒生士大夫的反复抨击，然而，实行思想一统乃是君主专制政治下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正因为如此，当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时，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其倡导者就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董氏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番话就对“六艺”的态度论，与李斯向秦始皇上焚书议截然相反，但就禁绝异端、发扬帝王一统意志而言，董仲舒与李斯可谓异曲同工，前后映照，他们两位都是在统一的专制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的主要智囊人物。不过，与鼓吹“以吏为师”的李斯比较，董仲舒要高明得多，他以“六经”为指针，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到了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比较吻合的文化形态，其独尊儒学的主张因而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于当世，而且在由汉至清的2000年间行之久远。

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原来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诗》《书》《礼》《易》《春秋》，亦一变而为儒家独奉的经典并被正式尊为“五经”。到了东汉，又增加《孝经》《论语》，合称“七经”。

西汉统治者既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复“立五经博士”(《汉书·儒林传》)，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自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汉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所谓“今文经”即朝廷为了便于经学流播，下令搜集流散民间、口头流传的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系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整理，遂有“今文经”之称。所谓“古文经”即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所发现的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系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古文经”不仅在文字上与“今文经”大不相同，而且在篇数上也不一致。

自西汉末古文经出现，学者内部就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派，他们不仅围绕“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版本、文字以及真伪展开激烈争论，而且在学术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的原则、方法上也有重大分歧。概要说来，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含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汉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尤为重要，以治《春秋公羊传》起家的董仲舒，在著名的今文经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从而建构起天人一统图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古文经学在王莽摄政时扶摇直上，东汉继续发展，大学者辈出，贾逵、服虔、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融、许慎为其中佼佼者。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古、今文群经，不拘泥于师承门户和学派壁垒，成为有汉一代隆盛经学的总结性人物。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汉末董卓之乱，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使久已摇摇欲坠的汉帝国终于崩溃瓦解。与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戮杀相推引，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近400年的战乱由此展开，政治舞台上角色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眼花缭乱。这一时期，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玄学崛兴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从西汉后期儒学被定为一尊后，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杂糅搭配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辅而行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烦琐解释的经学。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动乱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三国志·杜恕传》)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玄学的思维特点是超脱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对本体的思考，对无限的思考，当然不能依靠纯经验性的观察，还必须运用抽象的哲理，一股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之产生了新的生气勃勃的活力。魏晋学术亦因此而富于谈玄析理的色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次，玄学虽然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根本，但玄学家所说的达到无限，不是像西方黑格尔哲学那样以达到对“绝对理念”的纯思辨的抽象把握为最终目的，而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这就使玄学与美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魏晋美学的精魂。魏晋时期兴起的“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等，便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最后，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做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追求一种“萧条高寄”（《世说新语·品藻》）的生活；或“动违礼法”（《晋书·江惇传》），“以任放为达”（《世说新语·德行》）。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道教创制与佛教传入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借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璞、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民间劾治恶鬼、躲避死亡的种种迷信手段，如臂悬五彩、悬苇画鸡、桃符桃印、治邪驱鬼等也网罗无遗，发展成为禁咒、印镜等法术。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种宗教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儒、玄、道、佛相与激荡

儒、玄二学在魏晋时期冲突甚为剧烈。玄学推出之初，便大有“与尼父争涂”（《文心雕龙·论说》）的势头。玄学之士“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干宝：《晋纪总论》）。儒学之士则谴责玄学家好谈老庄，排弃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但是儒、玄二学虽然相互排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却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一些儒者注意到老庄之学具有救名教伪弊之功，玄学中也出现了推动玄学向儒学靠拢的修正派。“儒玄双修”之士的大量涌现体现出那一时期儒玄合流的趋势。

道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老庄之学结下不解之缘，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主干。道家的创立者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庄子也被列为道教尊神。《老子》《庄子》二书被奉为道教经典，称《道德真经》与《南华真经》。与此同时，道教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之中。范文澜曾描述儒、道二教关系，“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①，确是中肯之论。

佛教和玄、儒、道的关系颇为复杂。大体而言，玄、佛一拍即合，到了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碰撞，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7 世纪，当阿拉伯人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隋和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文化背景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士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隋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士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士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2 编，43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② 同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托，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学可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由此可见唐代文化开放的氛围。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上。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唐朝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精神被神学的黑暗蒙蔽时，中国人的精神却充满着开放、包容和探索欲望。”

所谓“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而中国诗的辉煌巅峰则在唐代。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①

诗歌女神确乎特别垂青于唐代，这是一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一方面，文人创作的诗篇可以传诵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白居易：《与元九书》）、“牛童、马走之口”（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卖于市井”，题写于“观寺邮侯墙壁之上”（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吟诵于“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白居易：《与元九书》），乃至谱

①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8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写成流行歌曲，诚所谓“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王世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序》)。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对诗歌创作，充满了高涨的热情，“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校录·望远行》)，“人来人去唱歌行”(刘禹锡：《竹枝词》)。白居易说“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与元九书》)，指明了“有唐吟业之盛”(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是一个诗歌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仅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900余首，诗人2300余家，而兔起鹘落的历史岁月必然湮没了更多作品与诗人。在难以数计的伟大诗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以千古绝作雄盖一世的诗歌巨匠，又有杨师道、王勃、杨炯、骆宾王、七岁女等文思敏捷的神童诗人，还有上官昭、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才思超群的女诗人。正是经他们的杰出创造，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善，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与中国诗的历程几乎一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篆书圆劲，阳冰篆法为后世所多循；草书飞动，“颠张狂素”将狂草发挥得淋漓尽致；行书纵逸，李邕、颜真卿的“麓山寺碑”“争座位帖”最为艺林所重；楷书端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之地步。与唐代诗坛推出李白、杜甫作为中国诗典范性人物同步，唐代书坛也推出中国书法的宗师——颜真卿与柳公权，诚如苏轼所言：“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书黄子思诗集后》)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黄金时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画圣”吴道子改造传统线描技巧，“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以“莼菜条”型线条的创造，大大提高了线条在画面上组织物象基本结构的功能，丰富了线条的美感，深刻地活化了线的生命力。在画科上，唐代绘画也是全面发展。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雅淡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花鸟画也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唐人张彦远用“焕烂而求备”(《历代名画记：论画方法》)一语概括唐代绘画的气派，其言确然。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其领袖人物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观念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繁盛时代。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750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昭陵雕刻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骏马，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样式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气，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宋型文化的特有风貌。

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功业。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因此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外来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惆怅，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宋代词坛还有别一番风貌的歌唱，即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词雅，宋画也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士大夫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无不表现出与宋词、宋画相通的性格。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市民文化之勃兴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了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教育和科技成就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的发达。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如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这样一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明人徐有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范文正公集补编》卷四《重建文正书院记》)宋文化繁盛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且创见迭出。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一书作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会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了丰富营养。在辽，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贾岛之诗成为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苏轼的诗更为辽人熟悉和喜爱。在汉文学的影响下，辽国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通风雅”(沈德潜：《辽诗话·序》)。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至宋仁宗时，西夏如富弼所述，已是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国学除学习经书外，还要学习《老子》《荀子》等诸子典籍，读《史记》《汉书》等史书。宋朝流行的典章制度也在金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行，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金史・选举志》)，其考课之法亦仿汉唐之制行之。建立于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完全以汴京为模式，其设计和施工的主持者均是熟稔儒学建都规制的汉族士大夫。金人对汉族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中国北部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士祯：《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13 世纪，从蒙古高原席卷而来的铁骑旋风震荡着欧亚大陆，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1260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蒙古上层贵族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并取儒学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中原，然而，冲突和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元史・徐世隆传》)。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欧阳玄：《赵忠简公祠堂记》)的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元朝统治时期，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以其有用之才”，“抒其怫郁感慨之怀”(胡侍：《真珠船》卷四)，表达了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普通民众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记》卷五)

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地理志》)。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迁居中国，一个信仰伊斯兰教而又浸润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回民族渐趋形成。

元代中西交通的开辟，为基督教入华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元人将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有两大派别，其一为曾流行于唐代的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里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二为初次入华的罗马天主教。景教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其教徒遍及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以及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天主教则首先立足于元大都，然后将传教触角从帝都向外地扩展，教徒发展至30000余人。

亚欧大陆的沟通，亦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275—1291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南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这位威尼斯人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游纪》。书中，他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娓娓动听地描述了中华帝国的美丽、富饶和繁荣。从此，东方的中国成了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远渡重洋，开辟新航道，都是在全力追寻这样一个遥远的梦。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而来。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跟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完全相同。

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入欧洲。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为辉煌灿烂。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中国古典文化，其生命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们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阶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界。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明史·练子宁传》)，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知(智)”之语，朱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明代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戮”。“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

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氏之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之学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离经畔(叛)道、颠倒是非者，摭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帝还一手操纵了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0000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蒐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洊澼百金方序》)。中国文化遭到了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早期启蒙思潮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个性解放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文化做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卷二)，“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四)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蒙昧主义相对立。

然而，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为例，它们虽然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不可谓不巨，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仍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不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象征，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承传不坠以及向前推进来说，乾嘉学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清朝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工业革命正在勃兴，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绝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呈不可避免之势。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等编著：《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3. 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增订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考题□

1.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史上居有什么样的地位？

2. 儒学是怎样崛起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

3. 试比较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有何不同，并思考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社会经济原因。

4. 明清文化与以往比较出现了哪些新的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